

跨学科视域下的体育与政治研究

——Alan Bairner 教授学术访谈录

田恩庆¹, 姜凯笑², Nicholas Wise³

摘要:通过学术访谈的形式,英国拉夫堡大学 Alan Bairner 教授深入讨论了体育与政治研究领域的基本特质、理论方法运用以及该领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等广泛涉及学科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体育与政治研究具有跨学科的属性,而他自己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开展体育与政治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批判性地综合运用社会理论与质性研究范式,以生动呈现并深入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与体育相关的政治议题;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和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一样,不得不面临新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环境、学科发展中的“双重边缘化”、体育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限制等学科内外多重挑战。最后,他还评析了中国体育发展及其亟待研究的相关议题,并希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推动学科知识的积累做贡献。

关键词:体育与政治;跨学科;社会理论;挑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21)04-0001-

体育与政治问题是当前西方社会科学中一个新兴的热点研究领域,并逐步迈向学科制度化发展之路。2006年,英国政治学研究协会(PSA)首次设立了“体育与政治专家组”,成为该组织的第59个成员;2008年,首个专业学术期刊《国际体育政策与政治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olicy and Politics,以下简称 IJSP)正式发行。作为该刊的同行评阅人与编委会成员(2010-2015),来自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运动与健康学院的 Alan Bairner 教授在国际体育政治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具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1]。迄今为止他发表了300余篇学术论文,其代表性专著是《体育、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欧洲与北美视角》,还编辑了《分裂的爱尔兰的体育、宗派主义和社会》《Routledge 体育与政治手册》等10余本专业书籍。最近,他所撰写的论文《体育、运动场与国家表征——英国国家体育场的政治学诠释》被我国学者熊欢教授译成中文发表,为我们探讨体育政治领域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2]。鉴于 Alan 教授长期从事体育与政治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该领域的发展具有独特的见解,笔者就涉及该研究领域发展中较为广泛的议题同他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学术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与我

国学者共飨,以便为我们准确把握本领域发展的国际图景和研究要义,并为推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进步提供有益借鉴。

1 体育与政治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属性

问:您在拉夫堡大学的头衔是“体育与社会理论教授”,但从求学经历来看,您本科修读的是政治学专业,博士论文还系统探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3]。您为何选择研究体育?

答:这要从我的本科说起。一开始,我读的是英语文学,后来发现自己对政治学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大二就改修政治学了。虽然在爱丁堡大学教育学院我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但仍然希望自己今后能够继续从事政治学方面的研究,随后又成功申请到赫尔大学的博士项目。而且,我还是一名铁杆体育迷,这主要得益于家庭的影响,父亲从小就培养我对体育的兴趣。在赫尔大学读书时,我成了学校英式橄榄球队的主力队员,经常参加足球、板球等项目的各种业余比赛。

实际上,起初我并没有考虑到将自己的体育爱好和政治学研究兴趣结合起来,直到博士毕业进入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工作后,遇到比我稍早来的同事约翰·萨格登(John Sugdon),我们都觉得体育领域蕴含了巨大的学术价值,尤其在当时分裂的北爱尔兰,人们参与体育活动时表现出许多具有冲突性的社会观念和行为。我开始从政治学视角尤其是葛兰西的理论观点来解释这类现象,从那时起我所发表的东西大部分都与体育相关,后来还讲授体育与政治相关的课程,并在那里获得了“体育教授”的头衔。在阿尔斯特大学工作了25年,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2003年便来到拉夫堡,继续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教学与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17BTY014)。

第一作者简介:田恩庆,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E-mail: tianenqing11@tsinghua.org.cn。

作者单位:1.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2. 利物浦霍普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英国利物浦 L16 9JD; 3.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社区资源与发展学院,凤凰城 美国 AZ 85281

收稿日期:2021-04-26 **修回日期:**2021-06-03

究工作。

问:您当时能在政治学院获得“体育教授”的头衔的确不易。根据您的经验,我们应如何理解“体育与政治”这个研究领域?

答:我来拉夫堡大学之初,就加入了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教授主导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小组”。我喜欢将自己定义为“社会学家”而非“政治学家”,因为后者只对政府机构的运作感兴趣,而我感兴趣是体育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以及如何促进人们构建或强化他们的社会身份认同等问题。所以,我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或者说自己是一名政治社会学家,这是我“体育社会理论教授”这一头衔的由来,人们对此或许会产生一些误解。

西方学界,存在“sportpolitics”“politics of sport”和“sport and politics”3种相似的表述。很明显,“sportpolitics”与体育政策之间密不可分,其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或相关的体育机构运作及体育政策的制定。当然,我从未忽略过这类研究,但我认为还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使体育活动影响到社会意识形态,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甚至体育被视为促使政见分裂或统一的工具。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更喜欢将自己的研究归为“politics of sport”而不是“sport politics”,因为后者缩小了研究对象和范围。

我目前正在撰写的一本书叫《体育与政治》,涵盖了体育与政府、政策、意识形态与政治活动方面的内容,因此我认为“sport and politics”的研究具有综合性,能够让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参与其中。然而,另一本和约翰·凯利(John Kelly)、李政宇(Jung - Woo Lee)编纂的《Routledge 体育与政治手册》,我更愿意在书名中使用“politics of sport”而非“sport and politics”。如果是巴里·霍利亨以及曼彻斯特都会大学的强纳森·格利克斯(Jonathan Grix)他们,则希望开展与体育政策和政治学相关的研究,所以他们主办的那个学术期刊叫 IJSPP,刊名就包含了“体育政策与政治学”。

总之,我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感兴趣,关注更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因素对体育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关注政府体育政策以及各种体育协会的决议。当然,如果用“政治社会学中的体育研究”,或更广泛地讲,使用“社会科学中的体育研究”来描述我的研究领域也许会更准确一点。

问: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所理解的体育与政治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属性吗?

答:绝对是!你这个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为什么坚持定位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乃至是社会科学家的原因了。在本科时我不仅学习了政治学和历史课程,还修读了1年的社会学课程,这构成了我的知识基础。在最近几年,我又试图回到在爱丁堡大学的最初的选择——英语文学,打算汲取这个学科的知识来从事体育研究。当然在研究中我还加入了一些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知识。可以说,体育与政治领域是我主要的研究方向,但自己的知识体系已经融合了社会学、历史学、英语文学、人文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无论如何,这需

涉足非常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因为这些跨学科的知识能够加深我们对体育与政治问题的解释。

2 体育与政治研究中的理论视角

问:在体育研究中,理论可以让我们超越对现象的描述^[4]。您作为“体育与社会理论教授”,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

答:理论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还能从中获取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在研究中,我经常借助社会学理论而非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比如卡尔·马克思、罗伯特·埃利亚斯、马克思·韦伯、米歇尔·福柯或者皮埃尔·布迪厄等人的思想,都会帮我更好地理解体育中的政治问题。

以马克思理论为例,无论他的理论分析还是经验论证,无不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如果立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视角,你也可以观察到每个社会都会有区别地表现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同式样,但我认为葛兰西理论考量的是人心,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当然,基于马克思的理论,你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些有趣的话题。在我主讲《体育意识形态与价值》的课程中,涉及到8个类型的意识形态,最开始两个部分是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对于学生而言这些话题相对轻松。但接下来的内容会涉及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环境保护主义。当我讲到共产主义时,以前苏联为例,发现共产主义可以直接影响前苏联体育组织及其运作;而对于社会主义,比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则似乎没有共产主义对体育那么直接地干预;在保守主义国家,虽然保守主义不直接作用于体育政策的制定,但很多价值观与体育的发展非常贴合,如倡导竞争和奖惩意识。这个课程可以给学生一些案例,让他们能够通过体育了解政治现象或运用社会思想理解体育。在此我想强调一点,我们的理论视角应多元,需要结合不同理论观点去讨论某一特定社会或政治环境下的体育。

问:马克思理论对体育社会现象具有极强的解释力,我们在今天应怎样客观评价这一不朽的理论?

答:马克思对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讨论是深刻的,起码在那个年代,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个无出其右的思想体系。当然,随着时代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发生变化,如今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也早已不存在马克思笔下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景象。

我在16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当时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党派被认为是具有激进和批判性质的社团。但今天的中国与西方社会并不相同,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可以撼动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思想家,建立了稳定的政治基础,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所以,中国并非照搬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并没有教条地尝

试搭建一个空中花园,而是建立了一个符合自身国情的强有力的政府组织,让人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经济和积累资本的空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强大的生命力。

问:在中国,这被称为“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前世界各地涌现出具有不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在体育研究中新马克思主义影响尤为深刻?

答:准确地讲,新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度其实并不高,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支而已,就像古巴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一样。在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也有许多不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发展就不完全相同。人们从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出发,衍生出不同的思想体系,例如我虽然声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但认同的却是葛兰西所发展的理论以及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的新葛兰西主义。但我认为,无论是安东尼·吉登斯还是福柯,他们都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纵使布迪厄创造性地使用了“区隔”“场域”等理论概念,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能够呈现更多的意义,实际上也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了一些新元素。

问:这或许正体现出经典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我们还注意到,您在研究中除了引用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外,还经常使用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学生埃里克·邓宁的型构/过程社会学理论?

答:是的,他们两人都是重要的社会学家,作为“莱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我的影响极大。我对埃利亚斯不太熟悉,因为他在1990年也就是我来英格兰工作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我同邓宁有着很深的交情。邓宁是一个非常杰出学者,受过良好的教育,热爱生活,受人尊敬;在学术上,我对他的型构研究方法非常感兴趣,他也认可我给他的研究所带来的启发和帮助。他还是我来拉夫堡大学的重要原因,因为在这里我熟人不多,而他所在的莱斯特大学与拉夫堡毗邻,直到2019年他去世之前,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交往。

我与邓宁对埃利亚斯的态度是相同的,类似于我们对马克思的态度。埃利亚斯的研究正是借鉴了很多马克思的观点,然而很多埃利亚斯的追随者对此却不屑一顾。这些人经常会在自己的研究中表达对埃利亚斯理论的推崇,重复埃利亚斯的观点,再次证明其理论的解释力。而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不仅充满了限制,实际上还与埃利亚斯的追求背道而驰。我在自己的研究中,会去引用马克思、埃利亚斯以及更多人的观点,希望能够综合他们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理论基础,而非简单地重复他们的观点,更不会不加批判地照搬他们的理论。

问:的确当我们展开具体的研究时,实际上潜在地运用了某些学科的理论。您认为,体育与政治研究是否会像体育社会学一样成为一门二级学科?

答:如果你在英国的一些大学修读社会学专业,你可能不会听说埃利亚斯的名字,而是韦伯、涂尔干、马克思等那些

经典社会学家的名字;如果你学习的是体育社会学,埃利亚斯的名字一定会首当其冲。当前,马奎尔的学生在英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知名大学教书,他们所传播的不仅是体育社会学的知识,他们还大力宣扬型构社会学理论,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学科知识的传播方式被简化了。当然,与体育社会学相比,体育与政治研究刚刚兴起,走向相对自治的二级学科还需要时间。

但我却不太希望体育与政治研究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与我们的作为、知识结构和整体学科发展水平不相符。邓宁在莱斯特大学修读的是社会学而非与体育相关的专业,他的硕士毕业论文主题就是足球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同样,邓宁当时的同事安东尼·吉登斯也是莱斯特大学的知名社会学家,他本科也是学社会学的,其硕士论文就对英国现代体育发展及其阶级关系进行了分析,此后还对英国足球有一定的研究。恐怕他们两人是英国最早研究体育的社会学家,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因从事过体育社会学研究而名扬四海,所在的莱斯特大学也成为当时英格兰顶尖的社会学研究机构。还有很多知名的体育社会学家也是先学习母学科后才从事体育研究的,比如我前面提到的约翰·苏格登在本科阶段学的是政治学专业,阿兰·汤姆林森的本科也是社会学专业。但今天像我们这些有着母学科背景从事体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人只具备体育专业的背景。

问:是否可以认为,当我们在从事体育与政治或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时,体育实际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而相关的母学科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

答:非常正确。马奎尔曾呼吁,我们的职业应被定义为“sociologist of sport”而不是“sportsociologist”,后者是美国学者常常给自己的定位,这意味着他们只研究体育是什么的问题。我非常赞同马奎尔的观点,他强调我们是研究体育的社会学家,把自己看成社会学家是一个重要前提,运用社会理论来研究体育,这不仅是在说我们要弄清体育是什么样子,而且更多要弄清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体育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3 体育与政治研究中的质性方法

问:研究中的方法运用与理论选择同等重要。纵观您所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使用的是质性研究范式,您为什么热衷于这种解释主义方法呢?

答:质性研究已经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虽然存在各种争论,但这种范式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个社会。我不仅是一个具有批判性的社会学家,但同时也关注这些解释性数据,因为这些数据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背景,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解释社会现象。

问:您的同事多米尼克·马尔科姆(Dominic Malcolm)指出,目前在体育社会科学正从量性到质性研究的“范式转变”^[5],您是否赞同他的观点?

答:这种趋势一直存在。虽然量性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在

一定程度上了解研究对象,但这种抽象和简化却不能使我们更深入地解释和呈现其中的原因。我并不反对利用量性数据来做质性研究,但量性研究中很难使用质性数据,因为量性研究太过于依赖大量的抽象统计方法,不能很好地融入一些额外的深度研究数据。虽然有人喜欢采用混合的研究方法,即使这样,量性研究数据一般也只是作为质性研究的部分基础。简而言之,量性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宏观抽象层面,而质性研究则关注微观具体层面,需要深入参与到“草根”的生活中去展开田野调查。

我想,美国和德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家最初都非常热衷量性研究。例如,早期关于橄榄球或棒球比赛中哪些运动员适合哪些位置的研究,人们往往喜欢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呈现出这些运动位置不符合黑人和白人随机分布的“堆叠”现象,但问题在于,这种研究能让你了解其中原因了吗?当然不能!

在英国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较多倾向于质性研究。我相信,除非同你的研究对象有过深度访谈,否则不能更好地了解他们;或许量性数据非常有用,但你需要更全面地解释这些数据。所以,刚才提到关于运动位置的研究中,你需要询问黑人后卫,问他适合这个位置是否与他的肤色有关,否则你根本不可能从这些平均数中了解到任何关于球员个人的观点……实际上,很多政治学研究者喜欢量性研究,比如多少资金用于某些体育的支出,何种体育政策产生何种社会影响等等。但作为批判性的社会学家,我更喜欢质性研究。

问:您还认为虚构的小说可以成为研究数据的来源^[6],这也属于质性研究的范畴吗?

答:是的。虽然大部分小说主题并不涉及体育,也没有提供相对深入的体育素材,但小说的故事情节作为学术研究数据已得到认可。我读过一些体育小说,并把这些素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如果在某一个理论描述中没有实际案例,也可以用小说素材或者创造一个故事来代替,虽然没有实际案例,但如果利用这个虚构的故事,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表达出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一项研究中,我曾使用了3本美国体育小说作为研究数据。通过小说,我们能了解一些特殊的体育角色,即便是虚构人物,我相信现实社会中一定存在相似的原型。由于电子产品的流行,原来喜欢参加体育活动的年轻人更愿待在家里看比赛,玩游戏。过去,他们经常出来参加体育活动,我们还可以找到访谈对象,而今天则很难找到,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只有小说家才能向我们描述这些人的故事了。

虽然很多球迷也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其中较典型的是足球流氓所书写的纪实小说或自传,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能了解球迷生态。但我还是认为小说家的故事是相对理想的数据来源,因为相较于这些足球流氓的作品,小说家在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上能力更强。

问:您对质性研究的偏爱,是因为希望更加深入地理解

人们为什么要通过体育运动来呈现不同的社会生活吗?

答:的确如此。当年,我住在北爱尔兰时,那里政治局非常紧张,冲突双方分别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和爱尔兰联合主义的支持者。在那个环境中,我能通过人们的日常衣着迅速辨认他们支持者哪一方:支持前者的人绝对会身着盖尔特足球队服或者凯尔特足球队的服装;如果人们穿着阿尔斯特橄榄球队的服装或带着板球球板,那他们则很有可能倡导爱尔兰联合主义。

体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符号,可以用来分辨人们从哪里来,或验证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而这是典型的社会学思维,不单单是站在政府的立场或运用政治学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社会。当然我与政府部门也有过合作,但我真正想做的是走进被研究群体,参与他们的生活并聆听他们对体育的心声,从中挖掘潜在的政治意涵,通过这样的研究,事实上这也验证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同体育兴趣之间的交叉与重叠。

问:这是否说明这些具有差异化的社会生活经验反而又塑造了人们不同的身份认同?我们的研究数据可以在不同层面展现出他们是谁,为何会成为这样的人吗?

答:是的。例如,美国知名的橄榄球运动员科林·卡佩尼克在2016年因反种族主义歧视并在赛前国歌奏响期间下跪表示抗议的行动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一个学生的论文中我看到关于他的故事:实际上,他并不是在非裔区长,相反他是由白人家庭抚养成人,在这种成长环境的影响下,自然而然他应该会认为四分卫的角色适合他,因为至少他的白人养父母不会给他灌输黑人不能成为四分卫的想法,在他头脑中,可能并没有什么“非裔”的概念。

还有一位有色人种的学生告诉我,他的白人养父母对待他就像对待普通白人小孩一样,因此他的行为上和黑人小孩完全不同,不喜欢说唱音乐,不喜欢“嘻哈”风格的服装,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是非常“白人的”,或者自己就是“白人”,只是肤色不同罢了。所以,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和身边的环境塑造了每个人的独特性,而我们的研究就是为了更全面、更生动地呈现和解释这些独特行及其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权力运作。

问:但是,要想深刻揭示这些生活图景背后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还需要运用批判性的研究方法^[7],在当前的环境下,您认为能有效运用这一方法吗?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毫无疑问,无论是英国还是其他许多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受到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例如,近年来英国本地学生就读大学的学费已大大增加,而在10年之前,本地学生的学费几乎为零。一旦学校开始收费,无论高低,学生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就发生改变,学生是学校的客户和教育消费者,学校应更大程度上去满足学生的各项需求从而吸引更多学生,获得更大资金收益。因此,在这种越来越浓的商业氛围中,英国的高校在课程设置和研究议程上更加趋利化,只要为学校带来更多经济上的获利,这些教学和研究活动就受到欢迎,但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将

批判性方法置于一旁。像我这种具有严肃批判性的学者在当前这种环境下生存极其不易,因为你不仅要清楚自己的雇主看重的是经济效益,而你还要去专心地教书育人,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4 体育与政治研究面临的挑战

问:您在主编的《Routledge 体育与政治手册》一书中指出^[8],在体育与政治学的结合上没有与其他社会科学那么深入,为什么?

答: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政治学家们常常认为体育存在于政治世界之外,况且他们只对政治体系——比如国体、政体、政党及其合法性等方面的议题——感兴趣。另一方面,形成这一现状与当前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义盛行密切相关。在英国的大学一直强调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比如说学习音乐,那你就得首先了解贝多芬、巴赫等古典音乐大家的作品,绝对不会首先让你学习披头士(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因为这些音乐被认定为世俗的流行音乐。人们对体育也有着相似的态度,体育常常被认为是休闲娱乐,往往不鼓励学生去从事体育的学习或研究,因为在英国正统教育系统中从事这些活动始终被认为是不体面的。

这种精英主义环境可能使政治学研究者很难关注体育了,纵使这种氛围逐渐在文化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些改变。例如,在英国第一个开设体育学院的大学——伯明翰大学,工人阶级文化、旅游文化、假期效应、流行商业电影方面的研究比比皆是,而政治学仍然非常缓慢地在接纳这些流行元素,政治学家们关注的主题依然紧密围绕政府机构的运作。但如果一旦说破了体育与政治研究的实质后,实际上它更贴近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问:所以,在您看来现代体育是一种“流行文化”,所以很难被主流学科的接纳?

答:是的,体育与流行文化本来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一些人问我在做什么工作时,我说是一名“体育与社会理论教授”,他们往往会迷惑不解,不知道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头衔。体育心理学家们也会遇到类似的尴尬,他们常常受到心理学家的质疑,体育心理学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运动员产生更多金牌的实用技巧,不适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同样,数学或哲学教授可能会对体育教授嗤之以鼻,认为从事体育研究只算是一种业余爱好罢了。体育与政治研究也不例外,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被广泛接纳还需要时间。

问:除此之外,体育与政治研究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挑战?

答:当然。毫无疑问,在英国的大学中,无论是政治学、社会学还是历史学的院系,都没有为我们体育研究留下一片容身之地。例如,我第一份工作是受聘于阿尔卡特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从事的却是体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当时,假如我获得的是体育专业相关的学位,则不可能获得这个职位,否则我就会受到诸如“这个搞体育的人懂政治学

吗”之类的质疑。这也是当前所有从事体育研究的人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因为我们很难在主流的社会科学院系中获得教职,最终也只有立足于体育院系了。

另一个挑战是我刚刚谈到过的经费资助问题。我所在的体育学院大部分资助项目都是来自理学和医学研究的同事,而且学生需要用实验室,还可以从他们的学费中获得资金。这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虽然很多学生喜欢体育社会科学课程,但学院领导认为这并不重要。我常常批评这类现象,因为建设和维护实验室需要大量投入,但我们所做的研究项目却是成本友好型的,你只需去田野调查,和你的研究对象深入交谈就可以得到数据,这不用花多少钱。现在每个社会科学专业学生缴纳的大笔学费都被用于理工实验室的建设,这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双重边缘化”的挑战:主流学科或者母学科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一席之地,因为我们关注的是体育,他们往往认为研究体育是不严肃的学术活动;而在体育学院中,又不太需体育社会科学,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不是获得研究资助的中坚力量。

问:这是否反映出体育与政治研究不太乐观的前景?

答:是的。我所见到的事实让人乐观不起来,因为大部分学校对建设理工科更感兴趣,导致社会学发展的边缘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我知道有一所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我的前同事阿莉·鲍斯就在那里的体育学院工作,在女性体育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作品,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耗费太多财力。我虽然不太确定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认可她的成就,但从她到了诺丁汉之后,体育社会科学的生存空间的到拓展。与之相反的是,在最近几年拉夫堡大学体育学院的社会科学一直受到挤压,虽然目前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未来一切的可能性都取决于学校和学院领导的整体规划,我只是希望我们也可以像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一样积极地发展体育社会科学。

而且,现代体育已具有相当高的社会价值,离开体育谈论现代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还是相信体育与政治领域同其他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一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上所做的贡献。

5 中国体育及其政治研究议题

问:您曾经到访过中国,也教过许多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也有一定的了解吧?您对中国体育尤其是您感兴趣的足球有何评论?

答:是的,中国拥有高效有力的政府,而且大部分体育活动都是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的,当前体育强国和足球梦的战略提出和实施,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体育的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足球,我一直心存疑虑,是否我们在实现足球梦的过程中真的需要足球俱乐部也能登上世界舞台?当然俱乐部的所有者有着足够的财力可以这么做。但需要明确

的是,如今中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得益于实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处在市场经济活动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从目前的表现来看,主要是俱乐部大量的资金用于引进外援上,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来提升中国足球的实力,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在向政府的要求靠拢,而另一方面又不忘市场运作。但在英国,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比如曼联足球俱乐部的老板们根本不会在乎英格兰队是否会赢得世界杯,因为这与球队在市场上的成功关系不大,俱乐部的管理层只是希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球迷从而赚取更大的商业利益,相对于在世界杯上的成功,如何吸引更多中国球迷可能对俱乐部来说可能更具吸引力。而且,英国政府也不会热衷于国家队的成功,他们会把这些事情交给足协来处理。

当然,在奥运会中有较多人项目,中国通常都能获得不错的成绩。但对中国足球而言,要想成功相对来说更加艰难,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足球实力都在提升,国际足球大环境就已经决定了这个项目的成功是不可控的。而且,足球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在中国也有着非常高的人气,拥有巨大的球迷市场,但我担心的是中国足球文化问题。曾经与很多中国留学生有过交流,他们几乎对西甲或意甲足球运动员如数家珍,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在这些球队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至少不会像克罗地亚人那么疯狂,因为足球对于克罗地亚人来说深入灵魂的体育运动;对于尼日利亚人也是,他们为了夺取世界杯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坚持和努力。

问:是的,中国足球的发展还任重道远。但在奥运方面中国表现突出,不仅成功举办了2008年奥运会,还将举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您对此如何评价?

答: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的确非常优秀,不单单支持团体项目,还大力发展个人运动项目,这种金牌战略无疑是正确且富有成效的。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马尼亚因其女子体操队的突出表现在奥运奖牌榜上大放异彩,但如果大力支持一个足球队,最多能在奥运奖牌榜上获得一枚金牌。在个人运动上的投入,收获的不仅仅是一枚金牌那么简单,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

美国人类学家苏珊·鲍尔在拉夫堡大学演讲时曾提认为,如今中国在奥运金牌榜的表现,主要来自于女性和奥运会新引入的项目。2022年的冬奥会,对中国而言,滑降可能还不是一个容易拿金牌的项目,因为奥地利选手已经在这个项目上统治了一个多世纪,但更多趋近于生活方式体育的项目,比如单板滑雪,我想中国会在这个项目上获得较多的奖牌,女性运动员可能会有突出表现。因此,我觉得2022年冬奥会值得研究,首先是它与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时间相距甚短,这也使得北京前所未有地成为了举办冬、夏季奥运会的城市,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其次,还能够与平昌冬奥会形成对比,是否意味着奥运会成为了亚洲的体育盛事,这也是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另外,关于中国个人项目尤其是

女性项目的发展值得研究,相对于足球运动,这些项目更容易获得世界冠军。

问:正如您所言,中国女性在很多项目中要比男性获得更好的成绩,我们应如何探讨这种独特的“阴盛阳衰”现象?

答:中国女性体育是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虽然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非常多的中国女性仍然愿意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做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但实际上自1949年后,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程度远远高于西方世界,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女性体育在中国崛起的原因?

中国的体育现象为学者们提供了研究女性体育的巨大机遇。社会科学中,除了人文地理学变得非常有影响力之外,女性主义研究也正在崛起。考虑到当今的大部分研究都是聚焦在男性体育上,对女性体育的研究显得格外薄弱,因此女性主义的体育研究具有极大学术潜力。我在过去对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都是关注男性体育,但在这几年自己开始与他人合作转向女性体育的研究了。我认为,当前亟需要更多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中国女性体育现象的研究。

问:我们还注意到,在中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的二级学科中,学者们正积极寻求“本土化”和“国际化”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努力?

答:很明显,过去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科学几乎是被西方世界所主导,参考西方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展开研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也存在一个问题,我并不认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因为不是每一个理论或方法都适用于别国的国情。比如,在女性研究中,无论是东亚女性还是穆斯林国度的女性,西方所传递的女性主义目的是为了证明女性可以被赋予更多权力,但这只可能发生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下。例如,中东的穆斯林女性还受到男权思想的制约,但我曾经与一些来自中东的女性有过交流,她们告诉我自己遵从的习俗是基于宗教信仰而非其他,所以单纯应用西方理论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解释每个地区的社会问题。

至于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对于许多非英语国家而言,一些英文国际期刊具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所以可以理解使用英文进行学术发表的愿望,这种参考西方学者的理论和方法非常有益。如何更好地国际化?我想,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合作,让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联合起来从事研究,一方面,能够清楚地了解中国乃至每个地区的特殊问题和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在西方学者的帮助下,不仅可以更为深入理解运用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还可以实现更准确的语言表达,把握英文期刊的写作要求和发表流程。而接下来就是要双方的协商和沟通,以确保理论与实际信息的对接。我现在常用这种方式去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而与我合作的学者也通过这种方式深入了解了西方的理论方法,还在国际期刊上成功发表。所以,通过合作会让中国学者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

问:对的,我们急需形成一个国际合作研究网络尤为

重要。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最后,您还对中国的体育与政治研究的未来有何希望?

答:今天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勃勃生机,是从事这类社会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至于未来,正如我刚刚所谈到的,还是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拥有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国际化视野,批判地运用社会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通过深度的质性研究,探讨中国乃至是全球体育发展进程中与政治相关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也要取决于这类研究者在中国能否得到资助。

在学术发表方面,我刚刚也谈到过,乐意看到中国学者能与西方学者展开更加深入的交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来讲好“中国故事”,产出具有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学术作品。我相信,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代,中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家们一定能为学科知识的积累做出更多的贡献。

近40年来,Alan教授坚持以社会(科)学视域下的体育与政治研究为志业,并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访谈中,他不仅全面阐释了体育与政治研究领域知识结构特征,还对研究过程中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虽然他忧心于本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但对未来却充满希望;尤其是他对中国体育的深刻评析和给我国学者的建设性意见富有极大的启发性。访谈之后,引发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研究中做到“跳出体育看体育,立足体育看世界”? Alan教授和他的同事Richard Giulianotti持有相同看法^[9],认为研究者需要打破“偏见”,拥抱“常识”,避免局限于单一视角,去综合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尤其是运用解释主义范式对当下中国乃至是全球体育问题进行不同层面地考察,展开批判性分析,厘清现象背后所隐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结构并予以完整地呈现,启发人们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此,Alan还为我们指明方向,即通过合作研究和跨学科视角,在对现实生活的“涉入”与“超脱”之间

保持平衡,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人类学的洞察力,进而准确地解释当下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现象,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仇军,田恩庆.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64.
- [2] BAIRNER A, 熊欢. 体育、运动场与国家表征——英国国家体育场的政治学诠释[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46(5):120-126.
- [3] BAIRNER A. Re-appropriating Gramsci: Marxism, hegemony and sport. In CARRINGTON B, McDONALD I (Eds.), Marxism, cultural studies and sport[M]. New York: Routledge,2008: 229-246.
- [4] MAGIRE J and Young K,2003. Theory, Sport and Society[M]. Bingley: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5] MALCOLM D. Sport and sociology [M]. London: Routledge,2012.
- [6] BAIRNER A. Sport, fiction and sociology: Novels as data source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2017, 52(5): 521-535.
- [7] BAIRNER A. Sport as a critique of politics: Everest climbing, na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politics in Bangladesh[J]. Global Discourse, 2015, 5(4): 553-555.
- [8] BAIRNER A, Kelly J, Woo Lee J. Routledge Handbook of Sport and Polit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 [9] 田恩庆,王新谱,Nicholas Wise. 足球社会学:研究范式与趋势——Richard Giulianotti教授学术访谈录[J]. 体育与科学, 2021,42(2):40-46.

Politics of Sport Research wit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n Academic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lan Bairner

TIAN Enqing¹, JIANG Kaixiao², Nicholas Wise³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Liverpool Hope University,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UK Liverpool, L16 9JD; 3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US Phoenix, AZ 85281)

Abstract: In this academic interview, professor Alan Bairner at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reviews the experiences in his academic career. He identifies himself as a ‘sociologist’ or ‘social scientist’ studying the sport and politics. He claims that it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which strongly connects with many of the issues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the sociology of sport. In this field, social theories such as Marxism, figurational sociology, as well as the qualitative/interpretivism paradigm,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and critically applied to vividly interpret the issues of sport and politics in daily life. However, like other social science of sport, this field is facing man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such as neoliberalism and elitism in the global high education environment, ‘double marginalization’ in the subdiscipline and restrictions on knowledge structure of sport scholars. Finally, Alan also comments o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some research agendas of sport and politics in China. He also hopes that Chinese social scholars of sport can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this subdiscipline.

Key words: *sport and politics;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theory; challenge*

CLC number: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1 - 9154(2021)04 - 00

(编辑 荆敏)